

論文摘要

晚明結社風氣蓬勃發展。「幾社」是「復社」在松江地區的分社。晚明「幾社」初創時有所謂「幾社六子」，即杜麟徵、夏允彝、周立勳、徐孚遠、彭賓、陳子龍等人。「幾社」從文學性的「文社」轉向政治性的「文社」。另外，陳子龍、李雯、宋徵輿稱為「雲間三子」；李雯在幾社中曾佔有重要性地位，因此筆者將李雯的文學作品與「幾社六子」社會詩做整體性研究，共同收錄在本篇論文之中。

晚明幾社六子及李雯受到《詩經》、《楚辭》、古詩、樂府詩、盛唐詩的影響，其作品具有《詩經》褒貶譏刺的精神，重視《詩經》的「采詩」，學習民間詩歌「情」、「真」的特色；學習《楚辭》香草美人的象徵手法，屈原的憂思離愁與忠貞愛國精神；學習《古詩十九首》「情」的特色；汲取樂府詩的敘事技巧與現實主義精神，吸收盛唐詩的藝術特色。幾社繼承明代前、後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文學主張，提出「古體詩學漢、魏；近體詩學盛唐」的文學主張，捨棄晚宋時期內容鄙俗的詩歌作品。修正前、後七子「摹擬以形式為主」的弊病，注重文學作品的內涵。吸收公安派與竟陵派抒寫「性靈」，提出「真」、「情」的文學主張，反對公安派末流粗率、淺薄，以及竟陵派末流「空疏」的文風。

幾社六子及李雯社會詩，關心社稷民生，具有現實精神，反映出孤臣孽子的心志。前期摹擬仿作，追求審美情趣與生活情境，抒發性靈，描寫「真」、「情」，表現出「綺麗」的詩風；後期詩歌，因遭逢國變，流露出感時憂國的情懷，反映出現實精神，呈現出「慷慨悲壯」的風格。

幾社的學術思想也受到東林與「復社」的影響，非常重視民族氣節與人才培養。幾社六子對雲間地區與吳越地區產生重要的影響。詩社方面影響雲間派、西泠派、登樓社、東皋詩社、海外幾社、南社等。經由本論文的研究，晚明幾社六子及李雯社會詩，在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其作品擺脫摹擬剽竊的陰影，修正前、後七子的缺點，吸取公安派的優點，將創作與理論相結合，形成獨特的風格。希望本論文有助於後人對明代文學史與社盟活動的學術研究。

關鍵字：晚明、幾社、幾社六子、李雯、社會詩。

晚明幾社六子及李雯社會詩探微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一、 個人動機……………1
- 二、 學術動機……………2
- 三、 前人研究成果 ……3

第二節 研究範圍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論文結構

- 一、 研究方法……………8
- 二、 論文結構 ……10

第二章 晚明幾社的時代背景

第一節 晚明時代背景……………13

第二節 文學環境……………17

第三節 晚明結社情形……………20

第四節 幾社的文學淵源

- 一、 《詩經》、《楚辭》、樂府詩的影響……………28
- 二、 前、後七子的復古思想……………38
- 三、 復社的影響……………47

第三章	晚明幾社六子及李雯的生平與作品	
第一節	幾社六子及李雯的生平	52
第二節	幾社六子及李雯的作品	82
第四章	晚明幾社六子及李雯社會詩內涵	
第一節	譏諷社會現實	87
第二節	關心社稷民生	92
一、	想念家園	92
二、	心繫社稷安危	95
第三節	描寫遺民心志	100
第四節	追憶師友與哀悼義士	104
第五節	六子間及李雯的唱和	111
一、	與詩社有關的唱和	112
二、	官場上的唱和	113
第五章	晚明幾社六子及李雯社會詩藝術特色	
第一節	現實精神	118
第二節	隱喻技巧	128
第三節	史事入詩	130
第四節	綺麗與悲壯風格	132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晚明幾社六子及李雯社會詩的評價	140
第二節	晚明幾社六子及李雯對後代詩社的影響	146
參考文獻		155~164

晚明幾社六子及李雯社會詩探微

第二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四、個人動機

筆者閱讀《中國文學史》時，思索文學創作與時代、環境的關係，明末黨爭和詩人結社的關聯性，明代傳統舊體文學，如古文、詩、詞，受程朱理學與八股文的影響，多尚摹擬，缺少獨創精神，形成一股擬古主義的風氣；另一方面，政治環境與社會型態的改變，書舖與印刷術的蓬勃發展，王門心學、公安派、竟陵派等學術思想，開啓自我意識與性靈，產生許多戲曲、小說、通俗文學等文學作品。明代詩壇前後興起「臺閣體」、前後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而學術思想是由程朱「理學」轉向王門「心學」，到晚明又走回程朱「理學」。晚明松江地區人文薈萃，詩社雲集，其中「幾社」是「復社」的分社之一，也受到東林的影響。由於時代的變遷，「幾社」從「文社」轉向政治性的「政治會社」。¹「幾社」初創時有「幾社六子」之稱，即杜麟徵、夏允彝、周立勳、徐孚遠、彭賓、陳子龍等六人。²松江舊稱「雲間」，「幾社」又稱「雲間幾社」，「幾社六子」也稱爲「雲間六子」。另外，陳子龍、李雯、宋徵輿稱爲「雲間三子」；韓范、王玠右、王烈、金天石、吳日千、何次張、吳懋謙稱「雲間七子」。³李雯很早就參加「幾社」活動，並且佔有重要地位，因此將李雯與「幾社六子」社會詩做整體性研究。「幾社六子」及李雯社會詩，其前期詩歌作品包含詩人「摹擬仿作」，追求審美情趣

¹ 郭英德〈明代文人結社說略〉《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1992年），頁28。明代文人結社有四種類型，即純粹之「詩社」、怡老之「會社」、「文社」、「政治會社」。純粹之「詩社」，是以流連詩酒和悟悅性情爲主旨。怡老之「會社」，往往帶有怡情養性的性質。「文社」是因應文人士子研究八股時藝、謀取科舉功名而興起的文會。「政治會社」是積極干預政治，捲入政爭與黨爭之中。參見郭英德〈明代文人結社說略〉，《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1992年），頁28。

² 杜登春《社事始末》（板橋：藝文印書館，1968年），頁4。

³ 宋如林等修、孫星衍等纂《松江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頁1278。又參見宋如林等修、孫星衍等纂《松江府志》，頁1277。王光承，字玠右，華亭人，著有《鎌山堂集》。王烈，字名世，著有《鎌山堂別集》。王烈是王光承的弟弟。金是瀛，字天石，華亭人，著有《蓬山集》。吳騏，字日千，華亭人，著有《頤頌集》。吳懋謙，字六益，華亭人，著有《苧庵二集》、《華萃初集》。何安世，字次張，華亭人，著有《晚蘭堂集》。

與生活情境，抒發性靈，描寫「真」、「情」，表現出「綺麗」的詩風；後期詩歌，因遭逢國變，流露出感時憂國的情懷，反映出現實主義精神，呈現「慷慨悲壯」的詩風。

五、學術動機

晚明政治腐敗，黨爭激烈，選拔人才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為主。文人士子要登科及第，必須學習時藝，並且熟習「八股文」與揣摩風氣。「文社」成為文人「以文會友」，互相切磋學問的場所。晚明結社風氣與書舖有密切關係，明代印刷術發達，那些應時的「制藝」必須要刻版印刷，書舖聘請「操持選政」的作家，編輯詩文集，並且出版大量的八股選本，為科舉考試的參考書。「幾社」是「文社」的性質，徐孚遠是「操持選政」的作家，編輯《幾社會義》初集到五集。⁴在學術動機方面，「幾社六子」及李雯受到《詩經》、《楚辭》、古詩、樂府詩、盛唐詩的影響，其作品具有《詩經》褒貶譏刺的精神，重視《詩經》采詩的重要性，學習民間詩歌「情」、「真」的優點；學習《楚辭》香草美人的象徵手法，屈原的憂思離愁與忠貞愛國精神；學習《古詩十九首》「情」的特色；汲取樂府詩的敘事優點與現實主義精神，吸收盛唐詩的藝術特色。「幾社六子」繼承明代前、後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文學主張，提出「古體詩學漢、魏；近體詩學盛唐」，捨棄晚宋時期內容鄙俗的詩歌作品，注重詩歌的內涵。前、後七子吸收公安派與竟陵派抒寫「性靈」，追求「真」、「情」的優點，反對公安派末流粗率、淺薄（清真）與竟陵派末流「空疏」的文風。晚明「幾社六子」都能面對現實，考量時勢變化，積極參與文學活動，關心民生福祉，心繫社稷安危，重視文人的氣節，表現出儒者的風範。「幾社」的讀書風氣非常興盛，重視學習與人才培養，登科及第的士子非常多，影響了當時的雲間派與西冷派。藉由研究「幾

⁴ 謝國楨《明清黨社運動考》（板橋：漢苑出版社，1975年，臺1版），頁113。對於社事的集合，有「社盟」、「社局」、「坊社」等名稱。結社與書舖很有關係。文人士子要揣摩風氣，必須要熟讀八股文章，因此那應時的制藝必須要刻版。那時候書坊裏的出版品，有三種：第一是制藝，第二是時務書籍，第三是小說。「制藝」這一類之書，有社稿、房書、課藝，文選會義等等名稱。書舖聘請「操選政」的作家來編輯詩文集，並且出版大量的八股選本，這些八股選本是科舉考試的參考書。

社六子」及李雯社會詩，探討晚明詩歌的流變，文人結社與社會情境，當可闡發文學的社會作用。

六、 前人研究成果

前人研究「幾社」的成果，仍有補充的空間。在社盟活動方面，有杜登春《社事始末》、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謝國楨《明清黨社運動考》。杜登春《社事始末》詳細記載「復社」與「幾社」等社盟活動的情形，說：「無徒追憶有生以來父事、兄事其間，正人君子聲教文章。……不禁嘆社事之有關世道人心，非細故也。」⁵這是寫作動機，深怕後人忘記前代文人社盟活動的情形，其目的是「聲教」，文章教化要有益於「世道人心」。謝國楨《明清黨社運動考》，大量引用了杜登春《社事始末》與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對朋黨與社盟活動的情形做有系統性的介紹。在文學史方面：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對於晚明詩人只列出十位，以陳子龍、張煌言、夏完淳為明末詩人的代表，但是對「幾社」則論述簡略。⁶鐘尚鈞、閻笑非《中國古代文學》，列出四位晚明的愛國詩人，即張溥、陳子龍、夏完淳、張煌言等，但未討論「幾社」。⁷復文圖書出版社出版的《新編中國文學史》稍微討論到「幾社」，也僅及陳子龍、夏完淳的作品，強調他們的愛國精神。⁸《中國文學理論史·明清鴉片戰爭前時期》〈明清之際文學思潮的轉變〉一章中，論述陳子龍將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理論相結合，提出「譏刺說」⁹，具有新的創見。朱則杰《清詩史》將陳子龍定位為清初的殉節詩人，強調陳子龍詩歌的現實主義

⁵ 杜登春《社事始末》，頁1。「余於辛未之秋，九月之晦，身羈塞邑，眇見寡聞間接邸抄得悉朝政感同心之日散，憂繼起之，無徒追憶有生以來父事兄事其間，正人君子聲教文章。凡六七十年中盛衰興廢之始末，釐然如在心目，不禁嘆社事之有關世道人心，非細故也。」這說明杜登春的創作意圖。

⁶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頁973。

⁷ 鐘尚鈞、閻笑非《中國古代文學》（高雄：麗文出版社，1996年），頁324。

⁸ 中國文學史編輯小組《新編中國文學史》（高雄：復文出版社，1992年），頁471。幾社的論詩宗旨，雖以前七子、後七子為依歸，但又別具一格，以陳子龍的詩為代表，風格悲壯豪放，語言比較穠麗。

⁹ 陳子龍的「譏刺說」繼承了政教中心的理論傳統，發展了其中干預時事的積極精神，但同時又強調遵循文學創作的特殊規律。參見黃保真、成復旺、蔡鍾翔《中國文學理論史·明清鴉片戰爭前時期》（台北：洪葉，1994年），頁35。

精神。¹⁰

在碩、博士論文方面：(一) 許淑玲《幾社及其經世思想》，分析了「幾社」的組織，社員結社活動的情形；並以《皇明經世文編》分析「幾社」的經世思想。評述「幾社」在中國黨社發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¹¹。(二) 王坤地《陳子龍及其經世思想研究》，談論陳子龍的復古思想，注重經世的目的，並且討論《皇明經世文編》、《農政全書》、《史記測義》、《皇明詩選》、《兵家言》等幾部經世思想的書¹²。(三) 白芝蓮《夏完淳詩詞研究》¹³。論述夏完淳的詩歌寫作技巧，詩詞的內容與特色，最後論述「幾社」的文學思想與學術地位。在期刊方面：研究徐孚遠與陳子龍的單篇論文較多，尙未有「幾社六子」的整體性研究。筆者希望探討「幾社六子」及李雯社會詩的文學內涵與藝術特色，以及對後代詩社的影響，重新評價其文學成就。

第二節 研究範圍

本篇論文的焦點鎖定晚明「幾社六子」及李雯社會詩。「晚明」時期的界定未有定論。主要以「幾社六子」及李雯詩歌創作時期為主，起於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迄於清康熙四年（1665），共有七十六年的時間。這段時期所要論述的歷史，主要集中在明神宗萬曆、熹宗天啓、思宗崇禎、南明三朝、清世祖順治、清聖祖康熙等時期。從萬曆十七年（1589）三月，神宗怠政，不理朝政，開啓黨派門戶之爭，歷經永曆十五年（1662），桂王在昆明被殺，南明滅亡，直到清康熙四年（1665），徐孚遠逝世為止。「幾社六子」有杜麟徵、夏允彝、周立勳、徐孚遠、彭賓、陳子龍等六人，其中杜麟徵死得最早，李雯與彭賓後來降清。

幾社初創於崇禎二年（1629），名稱源於「幾者，絕學有再興之幾，而得知幾其神之義也。」¹⁴成立的宗旨是要把絕學再一次復興起來，還要得知「神」（精神與內涵）的意義。關於「幾社六子」有六種說法：(一) 杜登春《社事始末》

¹⁰ 朱則杰《清詩史》（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19。

¹¹ 許淑玲《幾社及其經世思想》（師大碩士論文，1986年）。

¹² 王坤地《陳子龍及其經世思想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

¹³ 白芝蓮《夏完淳詩詞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¹⁴ 杜登春《社事始末》，頁4。

說「幾社六子」是杜麟徵、夏允彝、周立勳、徐孚遠、彭賓、陳子龍¹⁵，又說：「舒章〔李雯〕、子建、偉南、默公諸先生，…列參評而未得同列。」¹⁶可見李雯被列為評選的人物，未列入「幾社六子」。(二)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¹⁷認為除了「幾社六子」之外，還有李雯，書中指出杜登春把李雯排除在「幾社六子」之外，其原因是李雯投降清廷。(三)陳子龍〈六子詩序〉說：「周〔周立勳〕、徐〔徐孚遠〕輩六子皆余同學詩者也，其才情雄駿，用功深微十倍於余。…蓋憂時託志者之所作也，苟比、興道備而褒刺義合，雖塗歌巷語亦有取焉，今以六子之所託，大槩可觀矣。」¹⁸文中可以確定李雯還是被排除在外。(四)王澐《王義士輞川詩鈔》〈昔友詠〉云：「崇禎初，吳中名士有應社七子之名，我郡周太學〔周立勳〕興焉。太學〔周立勳〕又與同郡夏考功〔夏允彝〕、陳黃門〔陳子龍〕、杜職方〔杜麟徵〕、徐孝廉〔徐孚遠〕、彭司李〔彭賓〕復有文會，所謂雲間六子也。」¹⁹松江舊稱「雲間」。「幾社六子」稱為「雲間六子」。李雯還是被排除在外。(五)把李雯納入「雲間六子」，則有侯方域〈大寂子詩序〉：「孝廉〔彭賓〕初起雲間，與夏考功允彝、陳黃門子龍、周太學立勳、徐孝廉孚遠、李舍人雯互相唱和聲施滿天下，當時謂之雲間六子。」²⁰「大寂子」是彭賓在乙酉年（1645）之後改的名字。侯方域把李雯納入「雲間六子」，卻除去杜麟徵。(六)姚希孟〈《幾社壬申合稿（一）》序〉云：「近有雲間六七君子，心古人之心，學古人之學，糾集同好，約法三章，月有社，社有課，仿梁園鄴下之集，按蘭亭金谷之規，進而受，簡則勇，競倍於師，中聚而獻規，又譏彈嚴於柱，後此二百年來所未見也。」²¹文中沒有明確地說出「雲間六七君子」是誰？這是一個大問題，到底是六個人還是七個人呢？筆者認為「雲間六子」或者是「幾社六子」都是專有所指，而且在《松江府志》都有詳細記載。姚希孟說：「雲間六七君子」，即是泛指幾社同鄉份

¹⁵ 杜登春《社事始末》，頁4。

¹⁶ 杜登春《社事始末》，頁11。李雯，字舒章。宋存標，字子建。顧開雍，字偉南。王元圓，字默公。

¹⁷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頁187。

¹⁸ 夏允彝《幾社六子詩》，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明末刊本）。又參考陳子龍《陳忠裕全集》，潘錫恩（輯）《乾坤正氣集五百七十四卷》，頁16926。

¹⁹ 王澐《王義士輞川詩鈔》（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據藝海珠塵本排印），頁4。

²⁰ 侯方域〈大寂子詩序〉《四憶堂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刻增修本），頁430。

²¹ 杜麟徵《幾社壬申合稿二十卷》，頁484。

子，以地名「雲間」為界定，則成七子，可能包括李雯在內。

筆者認為幾社初創時是六個人。杜登春《社事始末》²²說出「幾社六子」，又〈六子詩序〉²³也說「幾社六子」。只有侯方域把李雯納入「雲間六子」，而姚希孟說「雲間六七君子」，卻沒有明確地說出誰是第七子。總而言之，李雯在幾社中曾佔有重要性地位，王澐《王義士輞川詩鈔》云：「歲在壬申〔1629〕，我郡有幾社古文辭之會，於時李內史〔李雯〕、顧徵君〔顧開雍〕諸公倡和始盛。風雅之緒，以迄於今。」²⁴文中說出李雯在壬申年（1629）加入「幾社」，李雯與顧開雍以及幾社社員互相唱和。宋琬肯定李雯對「幾社」的貢獻，〈周釜山詩序〉云：「雲間之學，始於幾社，陳臥子〔陳子龍〕、李舒章〔李雯〕有廓清摧陷之功。」²⁵文中「廓清摧陷」是指陳子龍與李雯反對公安、竟陵派的文風。宋琬〈尚木兄詩序〉云：「三十年來，海內言文章者必歸雲間。方是時，陳〔陳子龍〕、夏〔夏允彝〕、徐〔徐孚遠〕、李〔李雯〕諸君子實主齊盟。」²⁶文中說出陳子龍、夏允彝、徐孚遠、李雯在雲間的詩壇上佔有重要性地位。因此筆者將李雯與「幾社六子」社會詩做整體性研究，共同收錄在本篇論文之中，作為研究「社會詩」的重要資料。

現存六子的作品，主要是以台南縣莊嚴出版社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續修四庫全書》、北京出版社的《四庫禁燬書叢刊》為主。詩集作品有：（1）杜騏徵《幾社壬申合稿二十卷》，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小樊堂刻本）。（2）徐孚遠《交行摘稿》，板橋：藝文印書館，1968年，（據藝海珠塵本影印）。（3）彭賓《彭燕又先生文集三卷詩集一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縣：莊嚴出版社，1997年，（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六十一年彭士超刻本）。（4）夏允彝等選《幾社六子詩》，（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明末刊本）。（5）陳子龍《陳子龍自述年譜》，（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舊鈔本）。（6）陳子龍、李雯、宋徵輿撰，夏完淳編，《雲間三子新詩合稿》，

²² 杜登春《社事始末》是最早紀錄「復社」、「幾社」等詩社活動的書籍。杜登春是杜麟徵的孫子。

²³ 陳子龍〈六子詩序〉《陳忠裕全集》，潘錫恩（輯）《乾坤正氣集五百七十四卷》，頁16925。

²⁴ 王澐《王義士輞川詩鈔》（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據藝海珠塵本排印），頁4。王澐是陳子龍的學生。

²⁵ 宋琬〈周釜山詩序〉《宋琬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頁13。

²⁶ 宋琬〈尚木兄詩序〉《宋琬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頁18。

新文豐，1996年，（峭帆樓重校刻）。（7）陳子龍《湘真閣稿》，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據南京圖書館藏，明末刻本影印原書）。（8）李雯《蓼齋集》，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四年石維崑刻本）。以上詩集是作為文本研究的主要依據。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在第二章中，將周詩分為（一）宗教詩。（二）宮廷的樂歌：有大雅、小雅。（三）史詩。（四）社會詩：周詩有變風、變雅。社會詩描寫了百姓生活的悲慘，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與百姓的思想情感。包含諷諭詩、政治詩、軍旅詩、邊塞詩、戰爭詩。（五）抒情詩。²⁷參考劉大杰對「社會詩」的看法，筆者對「社會詩」的定義是：作者看到百姓的悲慘生活，內心有所感動，藉由詩歌的文學形式，以及「賦」、「比」、「興」等創作技巧，描寫社會現象與百姓的悲慘生活，抒發作者的真實情感，使詩歌作品能譏刺君王昏庸，政治腐敗，宣洩百姓苦悶的情緒，反映出現實主義精神。「社會詩」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重視文學與社會現實的關係。

本篇論文所論述的「幾社」是狹義的範圍，只說明成立之初的「幾社六子」，後來從「幾社」分裂出去的「求社」與「景風社」，就不再是本篇論文所論述的範圍。至於，「幾社」所刊刻的〈幾社六子詩〉，其六子為周立勳、宋存標、徐孚遠、彭賓、顧開雍、宋徵輿²⁸等人，是夏允彝編輯六位幾社社員的詩作，而不是幾社成立之初的「幾社六子」，因此，〈幾社六子詩〉就不再是本篇論文所論述的範圍。

晚明「幾社六子」作品的內涵甚廣，因此本篇論文只討論「幾社社會詩」的

²⁷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華正書局，1994年）。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在第二章中，將周詩分為（一）宗教詩：宗教性的頌詩是以周頌為代表，主要是祭祖酬神的詩歌。（二）宮廷的樂歌：有大雅、小雅。大雅是朝會之樂；小雅是燕饗之樂，描寫貴族宴會的情景。（三）史詩：民族史詩與歷史因素相關，包含傳說、神話、詠史詩。史詩可用敘事詩的形式來表現。（四）社會詩：周詩有變風、變雅。社會詩描寫百姓生活的悲慘，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與百姓的思想情感。包含諷諭詩、政治詩、軍旅詩、邊塞詩、戰爭詩。（五）抒情詩：在國風、二南中大多數是抒情詩，包含愛情詩、閨怨詩、送別詩、傷悼詩等。

²⁸ 夏允彝等選《幾社六子詩》（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明末刊本）。李雯〈幾社六子詩·序〉：「六子詩者，勒卣、子建、闇公、燕又、偉南、轅文之所作也。」《幾社六子詩》刊刻於崇禎五年（1632），六子是周立勳（勒卣）、宋存標（子建）、徐孚遠（闇公）、彭賓（燕又）、顧開雍（偉南）、宋徵輿（轅文）。這六位詩人有三位是幾社初創時的「幾社六子」。《幾社六子詩》是由夏允彝所主編，陳子龍、李雯、朱灝、宋存楠等編選。

範圍，主要是「幾社六子」所創作的詩歌作品，廣泛地包含諷諭詩、政治詩、軍旅詩、戰爭詩、詠史詩。至於，同儕朋輩寫給「幾社六子」的詩歌非常多，只討論具有「社會詩」特色的詩歌，包含唱和詩、傷悼詩、感懷詩、寄贈詩、送別詩等詩歌作品。本篇論文只研究晚明「幾社六子」及李雯社會詩的部分，希望對研究晚明文學的學者有所助益。晚明「幾社」尚有許多研究空間，希望後人有更全面的研究著作。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論文結構

一、研究方法

文學研究者不僅僅是享受閱讀作品的樂趣，還要探討文學作品的深層涵義，瞭解每一個作品的背後所賦予的意義，體驗情感，力求貼近作者的內心世界，對文學作品進行理智的分析，瞭解文學作品的意義，探討文學作品對讀者所產生的影響²⁹。換句話說，關於研究文學的因素有「作者」、「環境」、「作品」、「讀者」。文學研究者體驗的方式，分為主觀的情感體驗與客觀的分析作品。本篇論文是研究晚明「幾社六子」及李雯社會詩。研究方法：首先探論文學與社會的關係，瞭解文學的作用，從「幾社六子」所處的時代背景與生平，以及幾社的文學淵源等文學的外緣研究³⁰；其次，探討「幾社六子」社會詩內涵與藝術特色，分析詩歌作品的文學性與藝術技巧等文學的本質研究³¹。本篇論文的第二章晚明幾社的時代背景是文學的外緣研究、第三章為「幾社六子」及李雯的生平與作品、第四章為「幾社六子」社會詩的內涵等都；第五章「幾社六子」社會詩的藝術特色都是文學的本質研究³²，加上歷史探索與歸納以及比較。

²⁹ 丸山學著，郭虛中譯《文學研究法》（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3。

³⁰ 韋勒克、華倫著，王夢鷗、許國衡譯《文學論—文學研究方法論》（台北：志文出版社，1983年，第2版），頁19～27。所謂文學研究的外在法，就是研究文學創作的內在環境，有：文學與傳記、文學與心理學、文學與社會、文學與觀念等種類。例如：文學與傳記的關係，是透過作者的傳記，了解作者的背景、生活環境以及人生觀，呈現出作品的深層涵義。

³¹ 丸山學著，郭虛中譯《文學研究法》（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11。

³² 韋勒克、華倫著，王夢鷗、許國衡譯《文學論—文學研究方法論》，頁229～452。文學的本質研究法，就是研究文學作品本身的藝術技巧。例如：文學的韻律、文體、意象、隱喻、象徵、神話、文學的類型等文學特質。

何謂文學研究：文學研究者把自己的文學經驗轉換成學術名詞，然後再融入到一種前後貫聯的合理方案，形成知識或學問的一個科目。也就是說把科學方法應用到文學研究上。應用的範圍有模仿自然科學的法則，做為研究文學的前因和起源；或者是把科學的因果律用來解釋文學現象，找出政治、經濟、社會等條件是影響文學的重要因素。所謂文學的外緣研究，就是研究文學創作的內在環境，有：文學與傳記、文學與心理學、文學與社會、文學與觀念等種類³³。舉例來說，文學與社會的關係，有文學與社會環境、經濟、社會、政治等因素交互影響，文學要言之有物，作者的真實情感，反映當時的社會情況。第二章晚明幾社的時代背景，即是闡述文學與社會的關係。

文學的本質研究，是探討作品本身的研究，諸如文學語言、韻律、文體、文學的藝術技巧、意象、隱喻、象徵、神話等。研究文學必以作品本身為根源。第五章與第六章都是文學本質的研究。例如：第六章「幾社六子」社會詩的藝術特色，探討社會詩的隱喻、象徵、神話、寓言等藝術技巧，呈現慷慨悲壯的風格。

歷史研究的方法論，有（1）史料學；（2）史料批判；（3）綜合與分析³⁴。（1）在史料學方面：學習史學理論與基礎知識，釐清史料的意義與價值，積極蒐集史料，做史料分類與紀錄；如第一章至第二章。（2）史料批判方面：對史料做鑑別與辨偽，針對史料的來源做外部考證與內部考證，進而考證史料的內容，衡量史料的可信度，然後依照史料的價值分成幾個等級，對分等的史料做批判，呈現出史料價值的差異性；如第三章至第五章。（3）綜合與分析方面：做史料的解釋與利用，將史料在因果關係上予以聯結，具有聯貫性的結構，把握歷史事件的意義；運用到分析作品時，提供更清楚地詮釋。如第三章至第五章。從第一章至第六章都循著這些方法進行分析。

比較是把兩個研究對象或作品，並行地的研究³⁵。加以比較的兩個研究對象，要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或類似點。比如說：要了解作者的文學觀念，從縱的方面考察各個作者，受到時代背景的影響；橫的方面，比較同時代的其他作家。事物的特點與意義是相比較而存在的，經過「比較」的程序，更能突顯事物的優點³⁶。

³³ 韋勒克、華倫著，王夢鷗、許國衡譯《文學論—文學研究方法論》，頁19~27。

³⁴ 鄭樑生《史學方法》（台北：五南出版社，2002年），頁44。

³⁵ 丸山學著，郭虛中譯《文學研究法》，頁37。

³⁶ 鄭樑生《史學方法》（台北：五南出版社，2002年），頁9。

如第五章將「幾社六子」的文學內涵與同時代的人物，做比較研究。

文學研究的要素有作品研究、作者研究、時代研究、特殊研究等³⁷。本篇論文運用的方法，有文學的外緣研究、文學的本質研究、歷史研究、歸納、比較；某些研究方法都會交互運用，其目的是要呈現作品的意義與特色。

二、論文結構

本篇論文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分為三小節。第一節研究動機，分為個人動機與學術動機，以及前人研究成果，促使讀者能全面性掌握本篇論文的研究方向。(一)個人動機：從文學史的角度，思索文學創作與時代、環境的關係，探討晚明結社風氣與文學的關係，呈現「幾社六子」及李雯社會詩的風貌。(二)學術動機：探討晚明詩歌的流變，文人結社與社會情境，闡發文學的社會作用。

(三)前人研究成果：歸納與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第二節研究範圍，首先定義的「晚明」時期，主要是以「幾社六子」及李雯詩歌創作時期為主；接著陳述六種對「幾社六子」的說法。接著說出李雯在雲間詩壇的重要地位。最後說明詩集的版本。第三節研究方法與論文結構。第二章為晚明幾社的時代背景，分為四小節。第一節晚明的政治環境、第二節文學環境、第三節晚明結社的情形，探討晚明結社的風氣，論述幾社成立的經過與發展情形，分析明代文人結社的原因。第四節幾社的文學淵源，分為(一)《詩經》、《楚辭》、樂府詩的影響。(二)前、後七子復古思想的繼承。幾社繼承明代前、後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文學主張，提出「古體詩學漢、魏；近體詩學盛唐」，捨棄晚宋時期內容鄙俗的詩歌作品，注重詩歌的內涵。(三)復社的影響，說明幾社的學術思想，受到東林學派與蕺山學派以及復社的影響。第四節介紹幾社的文學淵源，使讀者清楚地掌握「幾社六子」學術思想脈絡，瞭解「幾社六子」的創作意圖，進而詮釋詩歌作

³⁷ 丸山學著，郭虛中譯《文學研究法》，頁1~49。作品研究包含素材研究、出典研究、背景研究、性格研究、結構研究、主題研究。作者研究包含傳記研究、環境研究、經歷研究、著作研究、思想研究。時代研究包含文學與時代、思潮研究、流派研究、讀者研究。特殊研究包含哲學的研究、社會學的研究、心理學的研究、自然科學的研究、民俗學的研究、文化的研究。

品的意義。第三章為「幾社六子」及李雯的生平與作品。第一節是「幾社六子」及李雯的生平。第二節是「幾社六子」及李雯的作品。瞭解「幾社六子」的生平，能輔助作品的閱讀與詮釋，探索詩歌作品所蘊含的精神與意義，評價作者在文學史上的成就。第四章幾社社會詩內涵，將「幾社六子」及李雯社會詩做分類，集中討論屬於社會詩範圍的作品，分析詩歌作品的文學內涵。第四章分為五小節，第一節譏諷社會現實：「幾社六子」從士大夫貶謫的過程批判政治現實，蘊含《詩經》的「譏刺」精神，呈現出文學的社會作用。第二節關心社稷民生，分為（一）想念家園：「幾社六子」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秉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平日注重人格修養與治學。從其詩作中可以看出「幾社六子」具有儒者的風範，如陳子龍對祖母非常孝順；彭賓在鄉里有「彭老佛」的美名。（二）心繫社稷安危：「幾社六子」一旦遭逢國難，移孝作忠，投入反清復明的大業，表現出「孤忠亮節」的氣節。第二節是從社會與經濟層面探討「幾社六子」社會詩。第三節描寫遺民心志：「幾社六子」重視民族氣節，面對國破家亡的殘酷現實，內心渴望恢復大明皇朝的國祚，於是招募有志之士，共舉「反清復明」的旗幟，然而，事與願違，終究失敗了。「幾社六子」社會詩流露出孤臣孽子的哀愁，反映出遺民心志。第四節追憶師友、哀悼義士：幾社成立的初期，要有師生關係才能入社，每個月有固定的聚會，師生情誼非常濃厚，其追憶師友的詩作，歌頌了師友的豐功偉業。幾社是非常用功讀書的詩社，注重人格修養，其哀悼義士的詩作，流露出真情。第五節六子間的唱和，分為：（一）與詩社有關的唱和：包含「社課」時的應制詩，「摹擬仿作」的詩歌作品、諷諭詩、政治詩、軍旅詩、戰爭詩、詠史詩。（二）官場上的唱和：從送別詩與贈答詩來看六子之間官場上的唱和。從送別詩中，呈現士大夫遭貶謫的憂鬱心理，或者是赴任與還朝的喜悅。從贈答詩可以看出幾社六子之間深厚的友誼，表現出豐富的情感。第五章社會詩的藝術特色，是從文學的表現方法來探討幾社社會詩，集中討論以下四部分：（一）現實主義精神：「幾社六子」能考量時勢變化，汲取樂府的敘事技巧，標題沿用樂府舊題，描寫百姓的悲慘生活，用精練的語言與對話，鮮明的對比，形塑人物

形象，細膩地刻劃人物心理，呈現晚明社會的風貌，反映出現實主義精神。(二) 隱喻。幾社六子所運用的隱喻，大多有言外之意，暗諷君王昏庸、政治腐敗，或者是貪官污吏的暴行。(三) 史事入詩。幾社六子及李雯社會詩善於運用神話故事與歷史故事，以古喻今，達到譏刺的作用；或者是抒寫身世之感，寄寓國家興亡之恨，表現出作者的民族氣節。(四) 綺麗、慷慨悲壯的風格。晚明幾社六子詩風分爲前後期，前期詩歌作品包含詩人「摹擬仿作」，追求審美情趣與生活情境，抒發性靈，描寫「真」、「情」，表現出「綺麗」的詩風；後期詩歌，因遭逢國變，詩歌作品反映出社會現實主義精神，呈現「慷慨悲壯」的詩風。第六章結論，分兩節：(一) 幾社社會詩的評價：對幾社社會詩做整體性的評價，並且分析後人對「幾社六子」及李雯的評價。(二) 對後代詩社的影響，以地域性來說，對雲間地區與吳越地區有重大的影響。在詩社方面的影響，有雲間派、西冷派、登樓社、東皋詩社、南社。論述幾社對後代詩社與詩人的影響，進而評價幾社在文學史上的歷史地位。

第二章 晚明幾社的時代背景

文學是由語言文字組織而成，用來表達作者的思想與情感。即文學作品是先通過作者的心靈活動，然後以語言文字的形式表達出來。作者在文學上所呈現的心靈活動是思想與情感³⁸，其中作者思想的形塑與時代背景息息相關，作者的創作思想，必然受到當時的時代氛圍所影響。研究時代背景的目的，是爲了理解各個作品中所描寫的時代與社會，瞭解作者的創作意圖與思想，進一步分析作品的文學內涵與特色，發掘作品的深層涵義。

本章所要處理的問題，是晚明「幾社六子」及李雯所處的時代環境，以及晚明結社的社會風氣。從文學與政治、社會、經濟的角度，探討哪些因素影響晚明結社的風氣。希望藉由研究「幾社六子」的時代背景，瞭解「幾社六子」社會詩的創作技巧與風格，反映出作品的現實主義精神。另一方面，從文學與社會的角度，來看黨爭與結社的關係，探討幾社成立之初的社會環境，說明幾社成立的動機與宗旨，幾社發展的情形，最後歸納出影響晚明結社風氣的因素。本篇論文所定義的「晚明」時期，主要是以「幾社六子」詩歌創作的時期爲主，也是以「幾社六子」的生卒年來規範這段時間。這段時間大約起於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迄於清康熙四年（1665）。共有七十六年的時間。這段時期所要論述的歷史現象，主要集中在明神宗萬曆、熹宗天啓、思宗崇禎、南明三朝、清世祖順治、清聖祖康熙等時期。對於「幾社」方面，所要論述的歷史是從明崇禎二年（1629）至清順治十七年（1660）爲止，共三十一年時間；將「幾社」興衰的過程與文學活動，做系統性的說明。以下將晚明的時代背景分爲政治環境、黨爭之禍、學術思想、文學環境、結社的情形等五小節，分別論述各種歷史現象。

第五節 晚明的時代背景

明自太祖洪武元年（1368），建都金陵（今南京），歷經 1421 年朱棣（成祖）篡惠帝之位遷都燕京（今北京），以至崇禎帝十七年（1644）殉國，共十六帝，歷時二百七十六年。1644 年明遺臣迎福王由崧即位於南京；1645 年唐王聿鍵即位於福州，是年魯王以海監國於紹興；1646 年桂王由榔即帝位於肇慶。1663 年魯王死於台灣。從 1644 年至 1663 年，稱爲「南明」或「後明」。南明小朝廷欲

³⁸ 涂公遂《文學概論》（台北：鼎文書局，1993 年），頁 41～80。

圖偏安的局面而不得。

順治元年（1644）七月，明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鳳陽總督馬士英等，在南京擁立福王朱由崧，改元「弘光」。順治二年（1645）五月，多鐸師至南京，福王朱由崧及大學士馬士英遁走太平。大學士王鐸、禮部尚書錢謙益等三十一人以城迎降。是年六月，豫親王多鐸遣軍追故明福王朱由崧於蕪湖，總兵官田雄、馬得功執福王及其妃來獻，諸將皆降³⁹。順治二年（1645），明朝總兵鄭芝龍、巡撫都御史張肯堂、前禮部尚書黃道周等，奉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監國，唐王旋即登帝位，改元「隆武」。同時餘姚、鄞縣在籍官員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等起兵，奉魯王朱以海在紹興監國。順治三年（1646）六月，清兵渡錢塘江，魯王兵敗，逃至澎湖，後來，投奔鄭成功。順治三年（1646）八月，清兵入閩時，鄭芝龍暗中與清朝勾結，於是唐王在汀州被俘，死於福州⁴⁰。順治三年（1646）十一月，廣西巡撫瞿式耜，擁立桂王朱由榔為帝，居肇慶，改元「永曆」。順治四年（1647），清兵兩次攻桂林，被明大學士瞿式耜和總兵焦璉等擊退；張獻忠部將孫可望與李定國，從四川敗退，進入貴州、雲南，表示聯明抗清。桂王政權達十六年，瞿式耜、何騰蛟、金聲桓、張同敞等人，以及晚明西南地區的義軍，都扮演重要的角色。順治十六年（1659），清兵分三路入滇，李定國戰敗，桂王逃入緬甸。清聖祖康熙元年（1662）二月，吳三桂在昆明殺了桂王。南明政權就正式結束了。

宋明理學又稱理學。先秦儒乃當時新興之平民學，其針對者，乃當時之貴族階級，即世襲的國君與卿大夫之流。宋、明儒則承接南北朝、隋、唐社會佛學餘波，其針對者在方外。宋、明儒由信轉悟，由教轉理。不重外在之教，而是要轉回頭到心悟其理。宋、明儒學從佛學消極悲觀的氛圍中脫出，回復到先秦，講求治國平天下，比較重視修身的功夫。宋、明儒講「理」，有兩個系統，一是周敦頤、程顥以至陸九淵、王守仁，比較偏從內心體會。二是邵雍、張載、程頤、朱熹，比較偏從外物條理去探究⁴¹。明代初期和中期的學術思想，朱學佔據著統治地位；明代中期之後，王守仁的「心學」非常流行。明朝非常重視程朱理學，把理學奉為官方思想，科舉考試所用的八股制義，與理學息息相關；除了科舉制度以外，在戲劇、小說、曲藝等方面，也受程朱理學的影響。明代學術，大體沿襲正統宋學，但是又於正統宋學中剔除周邵張三家，只沿襲朱陸異同的問題⁴²。明

³⁹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新店：國史館，1986年），頁82。

⁴⁰ 周明初《簡明中國古代史》，頁690。

⁴¹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蘭臺出版社，2000年），頁306。

⁴²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台灣學生書局，1977年），頁253。

亡之後，清初學術思想又趨向保守。明代學術思想分化，始於陳獻章的「江門之學」與王守仁的「姚江之學」；「江門之學」沒有廣泛流傳，而「姚江之學」在晚明非常流行。明代心學的代表人物是王守仁（1472～1528）。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浙江餘姚人，諡文成，他發展了陸九淵「心即理」的觀點，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學說。晚明王守仁的「心學」流行，有其原因：（一）人們自我意識的覺醒：王守仁「致良知」說，衝擊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二）在某種程度上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求。在君王的需求方面，要用「天理」作為維護封建社會的思想工具。在士大夫的需求方面，晚明政治腐敗，士大夫喜歡空談性理，不滿於程朱理學的禁錮。加上晚明大時代的經濟變化，工商業發達，造成人們自我意識的覺醒。（三）文人結社與政治結合，形成龐大的政治力：文人結社的風氣與講學活動蓬勃發展。明代書院的興起，書院的講學活動與「講會」制度，擴大了學術思想的傳播。明代文人結社的風氣，促進了文人士子的學術交流，形成一股龐大的政治力量⁴³。王學本身在發展過程中逐漸變異，它的通禪和禪宗化，產生了一些流弊⁴⁴。浙中王門派的王畿，被稱為「狂禪」；泰州學派的思想有明顯的禪宗色彩，泰州學派將王學逐漸引向禪宗化。王門後學的通禪和逐漸禪宗化，發展到後來越來越「空疏」。

泰州學派是從陽明學派分化出來的派別。泰州學派的代表人物，有王艮（1483～1541）⁴⁵、韓貞、顏鈞、羅汝芳（1515～1588）、何心隱⁴⁶（1517～1579）、耿定向、李贄（1527～1602）等人。李贄（1527～1602）字宏甫，號卓吾，福建泉州。李贄以「真儒」自命，痛恨鄉愿與假道學，上追孔子之精神，注重德性修養，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意在強調獨立思考，並非反孔，而是反宋明理學的教條⁴⁷。

⁴³ 張豈之《中國思想史》，頁 750～765。朱熹與王守仁的區別：朱熹的「理一分殊」，是把「天理」放在人心之外，有利於封建社會的統治者。王守仁把「天理」放在人心之內，「天理」即是「良知」，「良知」人人皆有，聖愚皆同，開啓人們自我意識的覺醒。

⁴⁴ 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態及文學個案》，頁 41。

⁴⁵ 張豈之《中國思想史》，頁 788。王艮提出「淮南格物」說、「百姓日用之道」說。「淮南格物」說，是針對「格物」論的解釋，其內容是人身與天下國家為一物，人身是本。「格物」是要認識根本，立本方可安身，安身之後才能實現家齊、國治、天下平；要求人人做到安身立本。「百姓日用之道」又稱「百姓日用即道」或「百姓日用之學」。「百姓日用之道」是以「百姓」為本，將百姓的日常生活視為「道」，滿足百姓的物質需求，並且否認「道」的神聖性。

⁴⁶ 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態及文學個案》，頁 39。羅汝芳是顏鈞的學生，羅汝芳提出「赤子之心」說。《中國哲學三百題》，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建宏出版社，1998年6月，初版二刷，頁 425。何心隱是顏鈞的學生。何心隱主張人性應順其自然，不須加以束縛，提出「育欲」說。所謂「育欲」說，是培育生活美好幸福的慾望。「育欲」說肯定了物質慾望的合理性，打擊了理學的禁慾主義哲學。

⁴⁷ 洪銘水〈明末文化烈士李卓吾的生死觀〉，《東海學報》（第 39 卷第 1 期，1998 年 7 月），頁 44～48。李卓吾，原姓林，名字為載贄，後改姓李；又因避聖朝諱，去「載」字而為李贄。李

他從厭惡假道學，而體悟「真」的可貴，提出「童心」說。李贄的「童心」說，批判了當時的復古派，為後來的公安派所繼承。他批判經典的權威性，被官方視為離經叛道的「異端」。李贄在《焚書·答以女人學道為短見書》辯駁時人歧視女人的偏見。李贄在《焚書·答以女人學道為短見書》辯駁時人歧視女人的偏見。李贄在《焚書·五死》中，歸納出「死亡」有五種情形，而以屈原之死為「天下第一等好死」，其次為「臨陣而死」、「不屈而死」、「盡忠被讒而死」、「功成名遂而死」⁴⁸，影響晚明士大夫殉國的觀念。

泰州學派熱衷於講學，接著是東林學派的崛起。東林學派是以顧憲成、高攀龍為首，關心社會現實問題，注重砥礪名節的精神；在學術思想上，企圖運用程朱理學來修正王守仁的「心學」；以注重時政為學術宗旨，批評王學末流的空疏之弊。從程朱理學衰落到王守仁心學崛起，再從王守仁心學發展為泰州學派的異端學說，明代學術思想經過兩次重大變化。晚明政治的險惡，官場的腐敗，造成兩種社會現象。一種是消極的態度，文人士子沉迷在奢靡浮誇之風，接受王門後學的通禪和泰州學派的異端學說，使得文人士子絕意仕進，或者棄官不就，因此，產生了許多名士、狂士、山人、隱士。另一種是積極的態度，文人士子熱衷時政，組織黨社，直言敢諫，評論朝政，抨擊時弊。以東林學派為代表。東林後裔關心社會和砥礪名節的精神，最後壯烈殉國者不計其數⁴⁹。南明時期以劉宗周與黃道周為代表。劉宗周（1578～1645）初名憲意，字起東，號念台，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學者稱戢山先生。劉宗周目睹官場的腐敗，不願意做空疏無用的學問，反對空談形而上的道，注重道德修養的方法，強調「慎獨」、「敬誠」。他在戢山講學，形成戢山學派，受業弟子有黃宗羲、陳確、張履祥。

明代學術思想，從程朱理學轉向王守仁心學，經過王守仁心學的蓬勃發展時期，一時王門滿天下，而王門後學的通禪和泰州學派的異端學說，開啓自我意識和個性解放的思想，形成王學末流的空疏之弊，一直到東林學派，以及劉戢山諸人，才再度走回程朱理學的路。到了清朝初期，政治環境等因素的改變，使得晚明「空疏」的學風轉變為「經世致用」的思想⁵⁰，即晚明的理學漸漸地轉變為清

贄的祖先有回教背景與海外經商波斯的經驗；他有「重商」思想，應該是受到回族以牧以商的生活方式所影響。李贄師事王襞（王艮的兒子）；思想上受到王畿、羅汝芳等人的影響。

⁴⁸ 洪銘水〈明末文化烈士李卓吾的生死觀〉，頁 49～54。李贄「童心」說，認為童心就是最初一念之本心，若是失卻童心，就失卻真心；失卻真心，就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就不復有初。

⁴⁹ 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態及文學個案》，頁 58。

⁵⁰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蘭臺出版社，2000年），頁 316。明末諸遺老，在北方有孫奇逢、張爾岐、李顥、顏元。在南方有黃宗羲、陳確、張履祥、顧炎武、王夫之、陸世儀、胡承諾。

初的經學。

第六節 文學環境

明初爲了鞏固政權，採取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考試時以四書、五經爲題。明初的詩文以宋濂（1310～1381）、劉基（1311～1375）、高啓（1336～1374）⁵¹爲代表，他們的文學作品，已經脫去元朝末年纖穠浮艷的習氣。從成祖永樂（1403～1424）到憲宗成化（1465～1486）年間，臺閣體風靡詩壇，臺閣體詩文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務求雍容典雅。臺閣體詩人以楊士奇、楊榮、楊溥爲代表⁵²。憲宗成化（1465～1486）、武宗正德（1506～1521）年間，詩壇出現了「茶陵詩派」，茶陵詩派是以李東陽（1447～1516）爲首⁵³，他想要用「雄渾之體」，來改革臺閣體的文風。他認爲學詩應當以盛唐爲師。李東陽的文學理論，成爲前後七子復古運動的先聲。孝宗弘治（1488～1505）、武宗正德（1506～1521）年間，李夢陽（1473～1530）、何景明（1483～1521）針對當時萎弱的文風，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摹擬以形式爲主」，他們的文學主張被當時許多文人接受，於是形成「前七子⁵⁴」的復古運動。前七子是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廷相、康海、王九思。接著興起的是，世宗嘉靖（1522～1566）、穆宗隆慶（1567～1572）年間，出現了「後七子」，後七子是李攀龍（1514～1570）、王世貞、謝榛（1495～1575）、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以李攀龍、王世貞爲其首，他們發揮前七子的主張，結社宣傳，互相鼓吹，彼此標榜，聲勢浩大⁵⁵。後七子強調對

⁵¹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頁 920。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潛溪，浙江浦江人。劉基（1311～1375）字伯溫，浙江青田人。高啓（1336～1374）字季迪，號青丘子，長州（今蘇州）人。

⁵²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頁 926。

⁵³ 《古典文學三百題》。茶陵詩派主要成員有以李東陽、謝鐸、張泰、陸釵、邵寶、邵寶、石瑤、顧清、魯鐸、何孟春等人。李東陽（1447～1516），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李東陽論詩頗受嚴羽的影響，認爲學詩應當以盛唐爲師，效法唐詩的音節、格調、用字，強調詩歌中的聲調作用。

⁵⁴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頁 928。前七子有李夢陽（1473～1530）字天賜，號空同子，慶陽（今甘肅）人。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號大復，信陽（今河南）人。徐禎卿、邊貢、王廷相、康海、王九思。

⁵⁵ 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 565。明世宗嘉靖 29 年（1550），成立「七子社」。「前七子」只是互相標榜，尚不見有結社的記載。後七子結社宣傳，互相鼓吹，彼此標榜，聲勢浩大。後七子結「七子社」的組織，使文壇捲入黨爭的旋渦之中。後七子是李攀龍（1514～1570）字于鱗，號滄溟，歷城（今山東濟南）人。王世貞（1526～1590）字元美，號鳳洲，亦稱弇州山人。謝榛（1495～1575）字茂秦，號四溟山人，臨清（今屬山東）人。宗臣（1525～1560）字子相，揚州興化（今屬江蘇）人。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

古人形式的摹擬，走上擬古主義的道路，忽略作品的內在精神。明嘉靖（1522～1566）年間，擬古之風更興盛，在這種思潮中，與前後七子相抗衡的流派是唐宋派，唐宋派有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茅坤等人。唐宋派以散文見長，反對「文必秦、漢」的論點，提倡唐、宋古文，提出「文從字順」的主張，來矯正前後七子的創作弊病⁵⁶。

到了明神宗萬曆時期，政治腐敗，舊體文學漸漸衰微的因素之下，王守仁的「心學」，動搖了程朱理學正統思想的地位。王門心學與泰州學派的思想，反映到文學創作上，形成晚明反擬古主義的風氣，重視小說、戲曲的價值⁵⁷。晚明王守仁「心學」影響泰州學派、羅汝芳、李贄、徐渭、焦竑、湯顯祖。

公安派是晚明萬曆年間的一個文學流派，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以公安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為代表。公安派受李贄「童心說」的影響。公安派認為文學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反對摹擬剽竊，提倡「性靈」說，強調「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文學作品是表現作家內心的真實感情，追求「真」；文學作品講求「俗」的審美情趣。公安派非常重視小說、戲曲、民歌的文學價值，突破了傳統文人的文學觀⁵⁸。繼公安派而後興起的學派，是以鍾惺（1574～1624）、譚元春（1586～1637）為代表的竟陵派。竟陵派一方面繼承公安派「性靈」說，另一方面試圖以「深幽孤峭」的藝術風格，矯正公安派末流與粗率、淺薄（「清真」）的弊病。竟陵派與公安派同樣講「性靈」，竟陵派於「真」之外還要求「厚」，「厚」就是救公安派的淺薄，而「厚」是需要沉靜以思，默察以辨，即「幽情單緒，孤行靜寄」⁵⁹。竟陵派用「雅」與「厚」來矯正公安派粗率、淺薄的缺失。宋琬〈紀行詩序〉云：「自公安、竟陵各為一家之言，以移易天下之耳目，而天下之奔走奉令、執囊鞬於壇坫者，息數十年。…學公安、竟陵者，如厭梁肉而就藜藿，其病為儂佻狂易、呻吟羸瘵。」⁶⁰公安派、竟陵派獨領風騷數十年，其詩文的缺點是輕薄狂妄、無病呻吟，文氣衰弱凋敝。朱庭珍說出前、後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的缺點，在《筱園詩話》云：「前、後七子高語盛唐，但摹空調有貌無神，宜招優孟衣冠之誚。蓋拘常而不達

⁵⁶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頁 944。唐順之（1507～1560），字應德，武進（今屬江蘇）人。王慎中（1509～1559），字思道，號南江，泉州晉江（今屬福建）人。歸有光（1507～1571）字熙甫，崑山（今屬江蘇）人。茅坤（1521～1601），字順甫，號鹿門，歸安（今浙江湖州）人。

⁵⁷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頁 914。

⁵⁸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頁 960。

⁵⁹ 嚴迪昌《清詩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34。

⁶⁰ 宋琬〈紀行詩序〉《宋琬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3 年），頁 32。

變，故習而成套也。公安矯以淺率，竟陵矯以晦僻，其魔尤甚⁶¹。」前、後七子主張學習盛唐詩，但是摹擬盛唐詩之後，卻是缺乏精神與內涵，容易招來「一味模仿」的譴責，拘泥而不知變通。公安派用「性靈」說來矯正前、後七子的弊病，卻流於「淺率」；竟陵派用「深幽孤峭」來矯正公安派的弊病，卻流於「晦僻」。

正當王學由盛轉衰之際，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抨擊時政，時常「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受閹黨魏忠賢的迫害，東林人都是恪守傳統儒學、身體力行的氣節之士⁶²，東林人由王學返回程朱理學的思想，深深影響晚明士大夫的心態和殉國情操。復社有「小東林」之稱，東林黨的思想影響復社。陳子龍參加復社之後，又組織「幾社」，思想上受到東林黨與復社的影響。晚明「幾社」所處的文學環境，正是公安派、竟陵派末流時期，「幾社」卻是大力反對竟陵派詩風。宋琬〈周釜山詩序〉云：

明詩一盛于弘治，而李空同〔李夢陽〕、何大復〔何景明〕為之冠；再盛于嘉靖，而李于麟〔李攀龍〕、王元美〔王世貞〕為之冠。余嘗以為「前七子」，唐之陳、杜、沈、宋也；「後七子」，唐之高、岑、王、孟也。萬曆以降，學者紛然波靡，于是鍾、譚二子起而承其弊。跡其本初，亦云救也。而海內之言詩者，遂至以王、李為諱。…雲間之學，始於幾社，陳臥子〔陳子龍〕、李舒章〔李雯〕有廓清摧陷之功，於是北地、信陽、濟南、婁東之言，復為天下所信從⁶³。

明代詩學的流程，幾社處於公安派、竟陵派末流的文學環境，高舉復古旗幟，大力反對竟陵派「幽深孤峭」的詩風，蔚然成爲一股復古風氣。宋琬〈尚木兄詩序〉云：

三十年來，海內言文章者必歸雲間。方是時，陳〔陳子龍〕、夏〔夏允彝〕、徐〔徐孚遠〕、李〔李雯〕諸君子實主齊盟，而皆以予兄尚木〔宋徵璧〕為質的，復有子建〔宋存標〕、直方〔宋徵輿〕為之羽翼，於是詩學大昌，一洗公安、竟